

陇上学人文存

樊锦诗 卷

樊锦诗 著 赵声良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樊锦诗卷 / 范鹏总主编; 赵声良编选.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226-04577-0

I. ①陇… II. ①范… ②赵…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②敦煌石窟—美术考古—文集 IV. ①C53
②K879.2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072028 号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张 菁
封面设计: 王林强

陇上学人文存·樊锦诗卷

范鹏 总主编

樊锦诗 著 赵声良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7 字数 347 千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978-7-226-04577-0 定价: 6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陇上学人文存》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陆 浩 刘伟平
主 任：励小捷 咸 辉
副 主 任：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 员：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二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连 辑 咸 辉
副主任：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员：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三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	连 辑	张广智		
副主任:	张建昌	范 鹏	马成洋	
委员:	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 范 鹏
副总主编: 王福生 马廷旭

总 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丛集荟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期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



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学理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1990年卷，1990至

2000年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文存》年出十卷,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则从1949至2009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百卷巨著蔚为大观,《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传之后世,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醇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年12月26日

编选前言

2013年是樊锦诗先生从事敦煌石窟研究五十周年的日子,《陇上学人文丛·樊锦诗卷》在这样的時候出版,有着重要的纪念意义。以樊锦诗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坚守敦煌,为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研究以扎实的功力和严谨的学风著称,樊锦诗先生的学术论著数量不多,却以解决石窟考古的重大问题,解决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难题为特色,对我们今天学术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樊锦诗,女,祖籍浙江杭州,1938年出生于北京,成长于上海。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开始了对敦煌石窟研究的生涯。1977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任副院长。1998年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并先后在兰州大学、东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担任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2007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历任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樊锦诗先生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敦煌石窟保护和研究事业,并在石窟考古研究、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她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具有开创性,为今后的石窟考古研究提供了借鉴,为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工作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一、石窟考古研究

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石窟考古研究刚刚起步。以往的考古学重在史前时代的考古,而对夏商周以后的考古,也主要针对遗址、墓



葬的发掘调查。对于佛教石窟,尤其像敦煌石窟这样延续千年的壁画和彩塑,怎样运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探索其年代发展等问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当时,北京大学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敏锐地看到了石窟考古的重要性,对樊锦诗等年轻学者寄予了厚望。在宿白先生的指导和众多学者的参与下,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拟定了一个长远的考古计划,就是要在对敦煌石窟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全面的考古报告,当时预计将出版 100 册考古报告,可以涵盖敦煌的所有洞窟。可惜由于“文革”的动乱,学术研究无法正常进行,致使撰写考古报告的计划一直未能实现。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在樊锦诗的主持下,考古报告的工作才重新提上日程。

从保护和研究的需要出发,作为考古报告就必须全面、完整、客观地取得并保存敦煌石窟遗址和遗物资料,就是要对敦煌石窟所包涵的每个洞窟从其建筑结构、彩塑和壁画的特征和内容,包括彩塑和壁画使用的制作材料和颜料,以及它们有无重建、重塑、重画,有无残毁塌圯、修缮等等资料和信息,都要全面、系统地调查、获取、整理、研究、编写,并出版考古报告。规模宏大的敦煌石窟数百个洞窟编写出版考古报告,无疑是一项浩繁、艰巨、长期的工程。樊锦诗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为使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同时,要为这项长期的“工程”能有序地可持续地进行下去,她从“洞窟开凿的早晚和它的排列顺序有极密切的关系”这一认识出发,依据多年来对崖面遗迹的考察和断代分期研究成果,经过反复思考和推敲,确定以洞窟开凿时代的早晚作为脉络,兼顾洞窟排列布局形成的现状为制订敦煌石窟考古报告规划的原则,编制了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分卷规划,也就是将敦煌石窟数百个洞窟科学合理地编排出多卷本考古报告。各分卷的洞窟组合,各分卷洞窟编排的序列,各分卷考古报告的撰写编辑体例等等的统筹规划。确定了全部敦煌石窟共

编写 100 册考古报告的规划,对每一册所包含的洞窟内容都作了规定,尤其是对一些与重要洞窟相邻而又无法独立成册的洞窟,把它们与相邻的重点洞窟进行相应的合并,这样就避免了遗漏那些非重点洞窟。这一举措纠正了以往考古报告计划的粗疏之处,具有前瞻性。

通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 266~275 窟考古报告》于 2012 年正式出版。这卷考古报告,通过多学科结合,以文字、测绘图和摄影图版等多种方法,完整、科学、系统地记录了莫高窟第 266~275 窟共 11 个编号洞窟的全部遗迹。

这是敦煌石窟的第一本考古报告,主要内容是对洞窟内容作详尽而客观的记录,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记录,而且还在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上具有多方面的突破:首先,通过敦煌早期三窟的主题内容——坐禅修行与弥勒信仰之密切关系,确认这种单纯的弥勒信仰源自犍陀罗传来的佛像体系,而与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典型的北魏石窟图像不尽一致,敦煌所体现的相对要早一些。其次,通过比对,早期三窟窟形、龕形、塑像、壁画内容、故事画构图、凹凸画法,以及一些细部特征,明显受到西域的影响,与龟兹石窟关系密切,并为敦煌北朝二期石窟所继承,给予敦煌以东的河西北魏石窟以强烈的影响;另一方面,报告强调本卷石窟中出现的阙形方龕和阙形建筑形象,仅见于敦煌莫高窟(早期,并延续至二期,以及邻近的文殊山早期个别洞窟),以东的中原和其他各地石窟均无此龕形,与云冈石窟的屋形龕大异其趣,就此揭示了与早期三窟同时或更早的敦煌、瓜州墓地频繁出现双阙建筑,敦煌及河西走廊许多砖雕墓照墙上也雕有双阙形象,进而说明本卷第 275 窟的阙形方龕体现的其实是敦煌及河西走廊的本地因素,与大同云冈石窟并无直接关联。第三,过去认为第 275 窟原建、重建、重绘有五个时代,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报告确认原建、重建、重绘至多有北凉、隋、五代三个时代,没有宋代和西夏。其四,本卷



洞窟中一向较少受人关注的第 266 窟,现有的塑像、壁画在隋代一次完成,因而被定为隋窟。但是考察发现其洞窟形制与早期第 272 窟十分相似,穹窿形的窟顶具有早期的特点,窟内的图像布局亦与早期第 272 窟相当一致,早期开窟隋代补绘的可能性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其五,通过对壁画的仔细观察,揭示了北凉、隋至曹氏归义军五代时期从起稿、敷色、晕染、线描的全过程及其特点,比过去的敦煌艺术研究更加细致,阐述更加明确。此外,发现了一些过去所没有观察到的迹象,例如,注意到早期壁画绘制的起稿、晕染应是在泥壁湿润的情况下完成,属于湿壁画的绘制方法。待泥壁干燥后敷罩白粉,于其上细笔勾勒,描绘细部。因年代久远,含胶的白粉层几乎悉数脱落,早期壁画面目全非,只留下绘制开始阶段变为黑色的粗线勾染和土红色的起稿,可能是湿壁画法的遗迹。如果此说可以成立,可依此纠正美术史上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湿壁画的观点。

《莫高窟第 266~275 窟考古报告》的特色还在于,刊出了包括测绘图版、摄影图版和数码全景摄影拼图。采用了三维激光扫描测量技术和计算机软件绘图的方法。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测量仪,又集成使用全站仪、全球定位仪、水准仪等多种测绘技术,如利用三维激光扫描仪的高精度坐标点,利用点云影像校正下的纹理图像绘制矢量线图,在石窟文物测绘图上以水平和垂直的方格线作控制示意,各窟以平立面关系图校正夹角误差,利用 GPS 技术取得测图基点的大地坐标数值,为完成绘图提供了准确的测量数据。绘图则采用 Microstation(微工作站)、Cyclone(赛孔)、AutoCAD 等计算机辅助软件,使绘图人员在电脑中准确地完成了本卷考古报告全部测绘图。第一卷考古报告采用先进的测量技术和绘图方法,完成石窟测绘图,是石窟考古测绘的重大突破,在我国考古学界处于领先地位。也为我国考古学界测绘技术提供了示范。考古报告还采用了敦煌莫高窟近景摄影立面图、

塑像等值线图、壁画数码全景摄影拼图,碳 14 年代测定、无损多光谱分析、介入性的剖面分析与 X 射线分析技术,对壁画和塑像制作材料和颜料做了科学分析,试图采用更多不同学科的技术与方法,进一步提升考古报告的科技含量。

考古报告的意义在于通过文字和图片的形式详尽记录考古遗址、遗迹,假设原址由于某种因素而不存在,通过考古报告是可以再现和复原出遗址、遗迹,而这一点向来仅仅是一种考古学的理想。《莫高窟第 266~275 窟考古报告》的出版,使我们相信,通过这一份考古报告的文字记录和其中的线描与照片,完整复原这些洞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 266~275 窟考古报告》是十余年艰苦调查研究的结晶,有的学术见解,可能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在酝酿。这一考古报告从资料的详尽程度和结论的令人信服程度,以及研究方法的可借鉴程度都是极高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考古报告出版后,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认为敦煌石窟考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著名国学大师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称此报告“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从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撰写的历程,也表明了真正的学术研究决不是靠“大跃进”的办法,快速“打造”能够成功的。如果没有反复的调查和持续不断的努力,没有深思熟虑,而在短期内为应付某种需要而拼凑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解决学术问题的。

对敦煌石窟进行考古分期排年,也是石窟考古的重要方面:用考古学的方法对每一个洞窟包括其中的壁画、彩塑进行调查研究,从而确定其年代关系,也是敦煌石窟考古学最基本的内容,同样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工作条件、生活环境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樊锦诗与敦煌研究所的马世长、关友惠、刘玉权进行分工合



作,开始运用考古类型学等方法进行分期排年的研究。通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是,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刚刚起步的学术研究半途而废。在无数次“批斗”、“运动”中,十年的光阴就过去了。直到改革开放的到来,樊锦诗与同仁们振奋精神,重新整理过去调查的资料,争分夺秒地研究。发表了《敦煌莫高窟北朝石窟的分期》、《莫高窟隋代石窟分期》及《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等论文,代表了以樊锦诗为首的研究小组在石窟考古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也代表了中国石窟考古研究的重大成就。

考古分期的研究决定着对敦煌石窟年代系统的基本认识。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对敦煌石窟作了一些基本的调查,并作了在当时来说是十分详细的笔记,其中也体现着作者对敦煌石窟年代的一些看法。可惜伯希和的笔记直到20世纪80、90年代才陆续出版。中文翻译则最早出版于1996年。1941年—1943年,张大千到敦煌作了较长时期的壁画临摹工作,同时对洞窟也作了详细的记录。但张大千的笔记也迟至20世纪90年代才出版。与张大千同时期在敦煌作临摹和调查工作的谢稚柳对石窟的记录辑成《敦煌艺术叙录》,于1955年出版。因此,在樊锦诗等学者进行石窟考古分期工作的时代,可以参考的仅有《敦煌艺术叙录》以及60年代以前部分学者为数极少的论文。但前人对于敦煌石窟时代的认识,大多依靠艺术风格特点的分析,可以说是粗线条的分析,而且还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如对莫高窟早期洞窟的时代,张大千把很多定为北魏、西魏(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中对洞窟的时代定位大体依据张大千的看法),却对早于北魏的北凉以及北朝晚期的北周较少认识。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初,工作人员也多沿用张氏编号和张氏对时代的划分。随着研究人员对早期洞窟的深入探讨,发现早期洞窟存在北凉、北魏、西魏、北周四个阶段。这一点在史苇湘先生主持编纂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中也体现出来。

但是如果经过科学的论证,对洞窟时代的判断可能仅仅限于推测。樊锦诗的研究小组对早期 30 多个洞窟进行长期的调查分析,采用考古类型学与风格分析相结合的办法,以部分有明确纪年的洞窟为标尺,通过对沿窟型制、彩塑的特征、壁画的主题和表现形式,包括图案流行的特征等等方面的分析,对现存早期洞窟的时代作了科学的定位,在《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中,不仅确认了每一个洞窟的时代,也使我们找到了敦煌石窟早期的发展演变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樊锦诗等学者继续对隋唐时期 300 多个洞窟进行深入调查,通过考古分期排年的研究,完成了《莫高窟隋代石窟的分期》、《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分期》、《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虽然在对北朝石窟分期研究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了一些时代排年的方法,但面对隋唐时代的洞窟,仍然有许多新问题要解决。早期石窟时代特征相对较明显,随着时代的更替,往往会有新风格产生。而在隋唐时期,风格的变化往往与朝代更替无关,不同的风格却会交叉出现。如隋朝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就营建洞窟 100 余座,其窟型、彩塑与壁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纷呈,使类型分析工作难度极大。樊锦诗等先生不仅对洞窟内容作了详尽的调查与分析,还深入调查了相关的佛教与历史文献,从宗教及历史背景方面探讨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从而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佛教石窟中出现的新样式新风格,并通过这些样式类型的特征,来分析其年代问题,使隋唐时期数百座洞窟的营建年代系列呈现在我们面前。通过樊锦诗等先生长期艰苦的研究,我们对敦煌北朝到唐代的石窟的年代序列有了清晰的认识。

严谨的考古分期排年,不仅得出了科学的结论,为敦煌石窟的时代判断提供了依据,而且在方法上形成了石窟分期的研究体系,如对洞窟型制的比较分析,对彩塑样式的分析,以及壁画的内容分布、表现形式的细微变化等等方面的类型学分析,综合多方面的类型与样